

哩尾公園的轉變

永續性、社會正義與公共空間的活化*

珍友莉** (林津如 譯)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le End Park
Sustainabil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Revitalisation of Public Space
by Jane HINDLEY (translated by Chin-ju LIN)

* 本文是 Jane Hindley (2007) 'A Park for the 21st Century: Observa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le End Park'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18, No.4, December 2007, pp 104-124.) 的中文縮簡版。感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邀請我在2009年6月21日於台北舉行之「都市更新下的社會與空間正義」工作坊上呈現這個案例。當時的討論對於看見英國勞工運動的重要與積極傳統十分有幫助，過去我或許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此外也特別感謝林津如安排此工作坊並協助翻譯與潤飾稿件。

** 服務單位：英國艾塞克斯大學跨領域人文研究中心
通訊地址：Centre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Essex,
Wivenhoe Park, Colchester CO4 3SQ, United Kingdom.
E-mail: jane.hindley@ntlworld.com

但當人們持續思考某些議題時，歷史教導我們，不論地理上或知識的距離，它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理想上，當一個新的概念在某地成形，一個新的運動隨即展開，而後可能發展成一個模型，可被改造成適合其他地方與執行的尺度。這些概念可能是被表達出來的權益與政策，不論它是短期或長期的。

(雷蒙·威廉斯，《希望的資源》，1989，頁273)

導論

這篇文章講述一件東倫敦的公共計畫，將開放空間中被忽視的區域轉變為「二十一世紀的公園」。計畫在1995至2002年間進行，當時布萊爾延續柴契爾改革路線，提出新工黨(New Labour)口號，為英國新自由主義的鞏固時期。在都會地區，新自由主義政策促使公共空間與都會空間私有化，加深社會不平等與隔離的效應。同樣地，政策亦傾向讓大型都市計畫朝向吸引觀光客的目標前進，以促進在地商業交易。相反的是，在哩尾(Mile End)的新公園則是立基於永續的原則，結合對於社會正義的關懷，並照顧當地居民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素養的需求。

英國都市中「為人民而生的公園」可回溯於十九世紀中葉工業化與都市化時期，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方向，哩尾計畫與社會改革和勞工運動等久遠的進步傳統息息相關。但其特別與創新之處在於關注環境，反映1992年聯合國地球高峰會的公共辯論，更有甚者，它不再把永續性與生物多樣性視為休閒遊憩的對立面，而將這些要素視為相輔相成。

本篇文章的重點在強調此互補性，這個案例的討論最初是來自於我從1990年(我開始成為哩尾的固定訪客)的個人觀察、紀錄研究以及與公園園長的訪談。對我而言，目睹改變的過程，無疑是當時喜悅和

希望的泉源，因為當時英國政治顯得絕望且前景灰暗，尤其對於永續性缺乏政治意願與想像。為台灣的讀者方便想像，我引述威廉斯的說法：「可能有一個模型能顯示，它有可能被改造成適合其他地方與執行的尺度」。

前情提要

雖然哩尾公園的建設主要介於1995至2002年，擴大哩尾公園的想法在1940年代已萌生。¹一開始由 J. H. Forshall 與 P. Abercrombie 於1943年《倫敦郡計畫》提出²，這個具有強烈企圖心的藍圖奠基於大量的調查，在納粹密集轟炸期間生產出來。此計畫受到理性規劃的思潮所影響，並被社會民主的熱情所感召，同樣的社會民主熱情使工黨在1945年取得政權，基進地接受人民對於議會的要求，成立福利國家。如同福利政策，Forshall 與 Abercrombie 為倫敦設計的重建藍圖奠基於早先勞工運動和社會改革的啟發與成就。

此計畫的核心為：與住屋和交通相連結的開放空間，這也是規劃者強力攻擊其「乏味沉悶」之處。當時倫敦有許多的公共公園、遊憩空地與遊戲場，如同英國其他城市，許多大型空間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勞工運動首次發生時設置的，有些是公共捐助運動（public subscription campaigns）的結果，有些則來自慈善捐款或議會法案。相對於仍保持排他性的皇家公園，這些公園清楚地為所有階級的人民而設，讓人們得以從惡劣、不衛生的都市和工作環境中暫時喘息，享受自在和健康。具裝飾性的園藝展示與音樂台的設計，公園很快成為市民驕傲的

1 Jon Aldenton and Lorraine Hart, 'Creating the Park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London's East End' (first published in *East*, 1998; 網路版 www.towerhamlets.gov.uk/data/discover/parks/mile-end).

2 J. H. Forshall and Patrick Abercrombie, *County of London Plan 1943* (London: Macmillan 1943).

象徵。到了二十世紀早期，當運動開始大眾化，公園設施通常囊括足球、板球場或運動場，由工人組織、本地議會和相關團體所共同購置。³

Forshall和 Abercrombie 的調查顯示，公園和其他綠地空間的分配相當不均，但這不能怪當地的社會運動不夠努力。如兩位作者提出的批判觀察，倫敦戰前的規劃者把城市視為一個整體地計算「人均綠地的總和比」(aggregated green space/population ratios)，以合法化新的收購，並經常在條件良好、較富區域的地方購買土地。⁴ 1943的計畫試圖強調這些不平等。Forshall 和 Abercrombie 強調需利用被轟炸損毀的土地，以開放空間圍繞所有社區，建立一個內部連結的系統，連絡主要公園到綠園帶與其他開放的鄉村空間(圖一)。⁵ 他們也建議了兩個「在地最小需求」以確保人人平等(至今仍然適用)：

(1) 每個人必須在離家半英里內有公共空間；

(2) 在每個行政區內需確保每千位居民擁有四英畝開放空間的人均綠地比。⁶

採取這些標準證實東倫敦行政區擁有全倫敦條件最差的人均綠地比，如同貧窮和住房指數一樣糟糕，它們必需有優先權。Forshall 和 Abercrombie 對東倫敦的核心目標是在哩尾設立一個新公園，它將使用一條遭轟炸區域的帶狀空間，約兩公里長，在攝政運河側約三分之一

3 Kostas Tzoulas & Philip James, 'Our Natural Heritage: Urban Park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Built and Human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Salford, 2004) available at www.els.salford.ac.uk/urbannature

4 Forshall and Abercrombie (同前書, p. 42).

5 同前書, p.3.

6 同前書, p. 43. 這時倫敦郡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管理全市，它在1964年更名為大倫敦議會(GLC)。區(borough)是地方的較小行政單位。郡與區彼此之間的權力與責任的分野因時而異，但通常而言，郡政府需對整體倫敦建設做策略性的規劃，例如教育和運輸等服務。自1890年代工黨執政之後，郡議會一直都很強，但柴契爾在1986年解散大倫敦議會(GLC)，許多功能被下放至區。

的寬度，連結北側維多利亞公園與泰晤士河，作為公園主景。計畫中這條帶狀和近楔形的空間，在沿公園與綠園道上將賦予法律保護。但在戰後緊縮和住房劣勢的脈絡中，建築物的考量優先於景觀之上，而1943年計畫中的結合遠景也隨之消失。

至1950與1960年代，在空氣品質提昇、工業區移出和碼頭關閉後，東倫敦有了戲劇化的轉變。規劃者的驕傲和注意力鎖定於能提供可負擔房租的「現代」房屋上，集合住宅大樓與複層建築成了他們關心的重點。在鋼鐵、混凝土與大眾擁有汽車的時代，都市的綠色區域得不到太多關注，柴契爾1970年代縮減公共服務設施，緊接著經濟衰退，在地政府被迫私營化其公共項目而非挹注投資，市府資產如重要建物和開放空間被迫售出，特別是社會住宅、學校遊戲場和公共遊憩場地等。在這難熬的時刻，哩尾的開放土地受到某些注意，但它並未形成一個大計畫，其他受炸彈轟襲的區域也多仍保持原樣而未被處理。⁷

到1990年代早期，當我開始經常造訪哩尾時，這個區域仍然是倫敦最窮困與最多種族混居的地方之一，乏味沉悶的風格仍在。破舊的街道無法產生樂趣與慰藉，扁平密集的住宅說明了市政府的忽視，哩尾路上的繁忙交通，看起來經常被醉漢與街友占據。與哩尾悲慘角落相對，位於一英哩外的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則擁有全然不同的景緻，投資數百萬打造出嶄新發亮的全球金融飛地，似乎象徵著柴契爾的遺緒與戰後更公正社會的計畫終點。

為二十一世紀而生的公園

將哩尾改造的計畫最初由兩個主要角色的密切合作所產生，一者是工黨掌控的倫敦塔橋區之地方議會，另一是環境信託。環境信託此

7 詳見 Aldenton and Hart (同前引)。

一非官方組織乃由中央政府之環境部門成立於1979年，致力於處理行政區(borough)中因轟炸毀損的荒地問題，但由於缺乏基金，目標很快地縮減。雖然哩尾曾是一個注目的計畫，在1980年代工作人員僅著手較小型的工作，例如修復鄰里花園。1990年代初期，對社會正義與環境永續性的雙重承諾成為驅動環境信託的精神⁸，此永續性的目標將建築於 Forshall 與 Abercrombie 的願景上，但「為二十一世紀而生的公園」只有在新機制重新投入公共計畫的經濟挹注時才得以實現。

新的經濟來源是1993年由首相約翰·梅爾設置的國家樂透基金，由千禧年委員會來執行。面對過去十年在公共投資的預算削減，包括顯而易見的公民基礎建設惡化，以及英國企業對公共事務投資的失敗(證明新自由理論的失敗)，梅爾不願修改已重組過的稅制。取而代之的是，樂透能生產新資金，同時扶持冒險和競爭的精神以鞏固柴契爾計畫。樂透基金大部分的初步行動都圍繞著核心的千禧年慶典上：格林威治子午線的圓頂巨蛋，餘下的則分配至較小的單元如藝術、社會、環境與遺產計畫等。⁹

當1995年千禧樂透委員會邀集投標時，環境信託與倫敦塔橋區成立一個和本地商業論壇的執行夥伴關係，並提交初步的投標。異於許多樂透案的旅遊傾向，它聚焦在地族裔差異的需求和社會經濟弱勢族群，它有三點核心概念：

- 全然不同的形式、功能和主題－藝術、運動、遊戲、生態，座落在公園的各部份，每個角落都能找到樂趣；
- 社區參與於設計和施作過程
- 這個公園是為展現永續性的新思想：它要證明如何把永續性的

8 環境信託策略式地運用「蜘蛛誘網」模式推行組織發展：它像催化劑，獎助未來能自主操作的計劃案(詳見 www.envirotrust.org)。

9 樂透(現稱遺產樂透, the Heritage Lottery)已取代大部分直接賦稅, 作為大型都市開發案的基金。如許多評論人所觀察, 這對向上再分配 (upward redistribution) 提供了有效的機制。

概念融入於建造與運作中¹⁰

與千禧委員會的初期討論十分良好，倫敦塔橋區議會提供四萬英鎊給社區作規劃週末，使此案更加完備。1995年9月這個規劃週末在一間本地小學中舉辦，參與者包括計畫的工作夥伴、三百位居民與專業設計和工程顧問。¹¹

社區規劃和協商耗費唇舌，但也從中生產新穎概念並形塑關鍵決定。在此週末的討論中，當在地居民發覺，「你不能放一些十九世紀的科技在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公園」後，「有螺旋滑梯、摩天輪和半永久露天遊樂場與馬戲團的好玩公園」被否決¹²，而致力於創新和永續的概念則被強化。會議同意一些大膽的景觀元素，並決定在計畫中放入商業區，以確保公園的後續維護費用。六個月後，一千兩百五十萬英鎊的標價(含其他合作夥伴¹³的基金)，加上本地居民、學校、商會和其他人熱烈信件支持的信件，最終獲得了千禧委員會的同意。

地景形塑與設計

1997年到2002年間在哩尾所進行的這項地景打造工程，最大的成就就是創造了一個寬闊、井然有序的公園。如果我們把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一併考慮進來，那就更令人印象深刻了：這些挑戰除了地形起伏變化大而且被哩尾路破碎分割的土地，還有新的中心與活動區域的多元組合。整個公園佔地達90英畝(如圖二所示)，卻沒有被淪為呆板的河岸帶狀活動中心，一切都得歸功於設計群的巧思。

位在公園中央的綠橋(Green Bridge)是設計上克服破碎地形限制最

10 Aldenton and Hart, 同前引。

11 同前書。

12 同前書。

13 其中包括了塔橋區、英國夥伴合作、公益信託和一些個人(同前書)。

引人注目的地景配置，它保護著公園，將來自哩尾交叉路口的噪音、煙霧和破壞視覺美感的景觀都阻隔在外。自公園內部，特別是從南邊走過，你只覺得自己跨過了一個小山丘(圖三)，唯有身在它的下方，沿著或橫越馬路時，才會發覺它原來是一座橋(圖四)。高低起伏的中央步道，則是公園簡介中所推薦另一個創造和諧秩序的特色配置。它確實發揮了很好的功能－環狀的步道帶領你穿過整個公園，和公園東側喧囂的馬路保持距離，卻讓西側的攝政運河親近可及。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細緻的安排和做法，也就是那些在規劃過程中達成共識的原則，都能在布局和設計上被具體落實出來，發揮作用。

- 保持基地的開放性 → 以地景的整合一致為優先 → 建築與結構物應融入地景，而非搭建於公園之上
- 尊重差異的品味 → 多元的親近方式與互補性
- 兼具趣味與歡愉 → 重視玩遊性(playfulness)與視覺上的驚喜

這些原則是這麼被整合起來的：首先，活動區域設計成盆狀並有視覺障蔽物－例如樹叢、護堤、草坡－分隔開來。實體空間上的分隔意味著不同的區塊並不會在視覺上互相競爭，反而形成了互補的關係。當你步行其中，會感覺每一處設置都充分地安居其位，牢牢地吸引著你的注意力，而不會讓你被週遭其他景物所分心。此外，在公園的布局上，綠橋的對稱形式，生態、藝術和兒童中心所座落的覆土建築，處處都鑲嵌著視覺驚喜，而產生了一種玩遊感(sense of playfulness)。視覺上的驚喜也內化在步行穿越公園的經驗中，當你沿著步道而行，或者走在曲折的小徑上，總會忍不住期待下一排樹叢四周，或者下一群小坡背後，會是什麼樣的景緻？

促進生態多樣性

1992年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已屆滿十七週年，在今日的英國，公園為蘊育生態多樣性之最主要地點的看法，仍被廣泛接受。各地議會

開始著手擬定生態多樣性的計畫，許多公園也從自1950年代標準的高度農藥管理方式轉型成更有益生態的做法¹⁴。然而，快速植栽文化的操作及美學標準仍然深植人心，多數人並不瞭解公園和花園有承載上限，或者高度使用農藥可能導致土地的荒脊。就好比飛地思維一般，它伴隨著工業資本主義而生，至今仍然有許多政客、規劃者和公園管理部門仍然死守著二十世紀的高度現代主義。¹⁵

在哩尾所採用的整合做法超越了這種封閉思維以及壓抑生態多樣性政策的保育倫理(preservation ethic)。有別於僅只是「保存」(preserve)自然，這股新思潮主張要「邀請」(invite)自然歸位，並且透過下列方式來達成：

- (1) 運用技巧建構一個更多元的地景
- (2) 創造能夠促進本地植栽與動物移殖的棲地
- (3) 採用對生態有利的管理方法
- (4) 以持續的實驗與創發增加棲地

在實際作用上，哩尾公園計畫使得維多利亞公園和泰晤士河之間的一條生態廊道得以確保¹⁶。儘管土地不連續，地景再造的過程使得棲地變得分殊，綠橋擴大了公園北側與南側的連結，景觀小丘增加了表面區域，三面新的池塘則提供了與運河互補的淡水棲地。同時，因為

14 綠旗獎計畫(Green Flag Award Scheme)鼓吹這個轉型。綠旗獎計劃是一個公園和綠色空間的國家標準，於1996年設立，並且由市民信託(Civic Trust)來推動。這個獎項的評估標準包括了永續性、生態多樣性和增益生態棲地等等。以全英國來說，獲獎數由1996年7月的55個增加到2006年7月的423個；以倫敦來說，這個數字則由4個成長到了82個(www.greenflagaward.org.uk)。

15 地景營造的高度現代主義方法，在下列這本書中有清楚的闡示：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 由於過去長期被忽視，這個地區原本就是野花和動物的天堂。但如果沒有公園的計畫，它們大概不可能存活下來。因為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這地方受保護的部分效力就已經被廢止(Aldenton and Hart, 同前引)；當時住房短缺的壓力削弱保護區的法律地位，使得既存公園以外的其他都市開放空間都受到威脅。

種植了大量的幼株，現在也有更多樹了。英國大多數公園裡往往僅有一些展示性的制式花壇，相較之下，哩尾公園則優先種植本地樹種和芳香藥草—例如吸引許多蜜蜂和昆蟲的薰衣草。此外，有別於典型的短齊草皮，哩尾公園裡大部分的草區在夏天都刻意留長以加速野花的繁殖、年度種子週期的完成以及草坪的建立。這些都對鳥類、無脊椎動物、昆蟲以及微生物有益。

永續性(sustainability)

氣候變遷說明了綠色空間在城市的未來將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僅是增進空氣品質的「綠肺」(green lungs)—一個打從十九世紀以來英國的慈善家和規劃師就一直鼓吹的功能，它們更是能夠平衡磚、水泥、混凝土所蓄存熱量的無價冷卻槽。所以僅僅是確保像哩尾公園(如今為某家公益信託所擁有)一樣的計畫，能夠在密集建成的都市鄰里中存在，就對未來世代的福祉有所貢獻，特別在近年營建量貪婪爆增的情況之下¹⁷。

哩尾公園計畫對於追求永續性的決心也明確地反應在公園的每日營運上，包括能源和自然資源的使用以及財務。在微觀層次落實永續原則意味著減少外部外入，轉換成可再生的資源，並且增加任何系統的自我支持程度；此外它也涉及到在內部次系統之間創造正面回饋的機制。這聽起來有點複雜，但如果運用這個邏輯來引導規劃與設計，事情其實非常簡單。

雖然追求物料永續仍在進行中，哩尾公園對於外來引水與肥料的需求非常低。綠橋本身擁有一個集雨水灌溉的系統；一座鑽井供應園區的非飲用水；不用石化肥料，而以草與其他修剪物來覆蓋地表。此

17 因為所有權屬於某公益信託(Charitable Trust)，可以保護哩尾公園的資產未來不會被脫產。

外，公園對於外來能源的依賴也很低：覆土建築有極高的能源效率¹⁸，可以在幾乎不靠外來助力的情況下為藝術、生態和兒童中心提供暖氣；水是靠池邊的一座風扇抽取；園區裡的遊園車則有部份由太陽能頂篷供電。

這座公園在財務方面是部分自主的。公園的基金可以收到顯著的捐款，不過約有三分之一的營運支出是來自綠橋下和公園內的商業出租。其餘的經費主要由倫敦塔橋區公所提供。低於預期的收益意味著人事規模會比想像中的小：只有一個主管和四名巡邏員，他們扛起了相當多的工作，從社會/遊樂活動到園藝和剪修等等。儘管如此，這位主管仍然顯得非常樂於任事。

預算限制使得執行原始計畫的進度比規劃中的慢，但這也許反而增強了對於永續性和公共參與的承諾。以永續實作為例：減少除草往往反而增益了生態多樣性並且減省了勞動支出。無獨有偶地，限制也使得藝術、生態、遊憩和安全等公開討論之間的緊密關係變得重要。公園的主管強調，這些討論不會只是官僚式的責任分配機制，而是公園營運的核心角色。成員們給的回饋確保公園所做的是在地居民想要的；居民的意見是無價的建議與專業意見來源（減少了外展和諮詢的開支）。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公園團隊擁有相當程度的營運自主性。它在倫敦塔橋區隸屬於環境與文化部門（而非公園部門）的結構位置，意味著主管可以針對永續性的概念進行實驗及操作，也在補助金及優先權等方面有決定權。因此，舉例來說，為企業志工舉辦的園藝季（以「團體營造活動」為名）向每位參加者收取十英鎊的費用，就用來承擔園區的剪修工作；此外他們也釋出資源給免費的公共活動，像是年度狗狗秀或者聖邦納貝斯園遊會。

18 這些建築使用由洛磯山脈研究中心（www.rmrc.org）所設計的系統來使得隔熱、太陽能取得、自然採光等均得到最大效果。

生態教育學與生態素養

哩尾公園展現了結合娛樂設施與生態多樣性的可行性，也是在這個生態讓人感到疏遠的時刻裡，增進對永續性和生態素養認識的重要資源。正如同環境科學家所強調，這對於我們企圖邁向一個更永續的社會是至關重要的。¹⁹

這座公園最顯著的教學功能是生態中心裡一家在地非政府組織為本地學校所開設的課程。生態/環境警覺性自15年前起就已是全國部定教材內容的一部分，但是那些課程總是和教室之外的日常生活具體實作無法有效銜接，特別是對都市中的孩童而言²⁰。公園裡的課程克服了這點，他們讓孩童有機會生動地體驗不同生態系統、觀察季節循環、蘊育了生態敏感度與熱忱²¹。

但是這座公園的教學課程更超越了正式教育。開放的規劃過程幾乎就是一個學習和反省的催化劑。目前公園已經就位開始營運，公園裡的燈泡是由風力和太陽能所點亮；覆土建築則是許多人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的；公園巡邏員安排了許多和增加生態棲地相關的免費活動；公園本身也使得民眾見識了另類的美學。高度現代主義影響二十世紀規劃的其中一項特質，就是崇尚整齊、幾何構成地景的美學價值²²。這種支配性的價值被快速植栽工業所強化，已經形塑了人們的期待、敏感度和品味。反過來說，以立基於永續原則的地景來串連人們，產生了另類的美學標準和敏感度²³。

19 David Orr, 'Ecological Literacy' in Jules Pretty, ed., *The Earthscan Reader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London: Earthscan Books, 1992), pp. 21-29; Jules Pretty, *Agriculture: Reconnecting People Land and Nature* (London: Earthscan Books, 2003).

20 這是 Ted Benton 在無數談話中反覆提及的論點。

21 Orr, 同前引。

22 Scott, 同前引。

23 Pretty, 同前引。

最後，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公園簡介和公共資料中所傳達的生態基本原理和為永續性而努力的目標變成了一般常識。由公園巡邏員發起的生態棲地營造活動，例如架設鳥屋或蝙蝠屋，往往是以樂趣為號召，主打的概念通常是「快樂交友，嘗點新鮮事」，而非「為地球付出一份心力」或者「拯救蝙蝠」。透過這種方式，哩尾公園的論述反轉了對於生態計畫總是要伴隨著犧牲、美德與高尚情操的刻板框架。不消說，這種講究實用和樂趣的宣傳概念有更強的吸引力，而且也更容易激起好奇心並驅動對於進一步知識和參與的渴望。

社會正義

都市中對地方生活設施投資的大小計畫，經常偏離了原本促進社會正義的目標，而帶來了縉紳化 (gentrification) 的後果。十或十五年前，哩尾只不過是個遼遠地鐵站和繁忙路口。人們會想搬到這一帶通常為了就近皇后瑪莉學院，或者眼於低廉的租金和房價、良好的運輸連結及鄰近倫敦中區、內城和碼頭區等。公園的活化改變了這一切，讓哩尾大大蛻變成為一個吸引人前來居住的地方。

公園的完工無疑地帶動了一波地方房地產市場的成長。不動產經紀人紛紛湧入，房價也開始上漲，許多新穎的套房住宅與公寓大廈已經在運河左岸原本荒廢的土地上蓋了起來。然而公園只是房價上漲的因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金融飆漲的連鎖效應，以及一般性房價膨脹。目前，中產階級的進駐看來似乎並不會擴散到運河岸以及少數街區和廣場之外的地方。

這個地區若要再更「縉紳化」其實有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低品質大廈住宅非常密集，中產階級有著對犯罪的恐懼以及對地方學校的憂慮。如今此地的社會經濟概況比以往更為混雜：毗鄰的幾個社區仍然相當貧窮，東南側的商店街是較為聽得見歡笑的地方，小商店(約半為孟加拉裔移民家庭所經營)還沒遷走，小餐館也仍然鄰里用餐的小地

方。每天、每週、每年挑選不同時段到公園四周走動，你會見到十分混雜的人群，這說明了此地確實如它所被設想的，服務著來自不同種族和社會背景的人們。

公共空間

十年前，地鐵站是哩尾一帶人們居住、工作、求學最重要的聚集地。現在，借用霍帕伍德和梅洛的話來說，這裡有個氣氛歡愉的另類選擇(*convivial alternative*)²⁴。在主流趨勢移向私有化、商業化、社會隔離和閉鎖的這個當下，哩尾公園創造了一個具吸引力的公共空間，一個社區的焦點，以及一種較為強烈的地方感。個人及社會於健康和福祉方面的獲益是多重的(極可能地減少了此區對於各種心理、醫療和社工介入的需求)。

哩尾公園提供了活動區域使得有相似興趣的人們可以在此相會、互動或者被捲動進組織動員的過程。既有的非正式團體可以盡興地使用此空間，確立社區和地方感的集體儀式也能夠透過年度活動而達成。此外，這裡也是一個形成非關私誼的社會力(*impersonal sociality*)的地方，有別於購物中心和時尚大街的另類發展案例。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在此聚集並體驗隨機的短暫相遇，也許交換一個恣意的點頭、微笑，甚或是與陌生人共渡一日的時光。正如桑內特(Sennett)所言，這種行禮如儀且非建立於私誼的社會力對於個人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關係有重要的情緒平衡作用。然而，這種公共空間帶來的好處常被忽略，人們常常只理所當然的認為這是因為此地的文化特別注重私人和親密的關係，進而形成個人滿足與喜樂的支持基礎²⁵。

24 參考霍德伍德與梅洛，Bill Hopwood and Mary Mellor 'Visioning the Sustainable Cit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December 2007, Vol. 18, No.4, p. 87.

25 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1971, 1998).

在像哩尾一樣存在著族群緊張關係的地區(少數酒吧外頭高高懸掛的英國國旗就說明了一切)，行禮如儀且非關私誼的人際交會也可能在社區關係上發揮正面的功能。上述酒吧的常客大概不可能因為使用了公園就改變他們反移民的立場或種族歧視的觀點。不過，正因為公園是來自不同背景和社區的人們所共享的休閒地方，它能夠產生相互認可、信任、放心的經驗，這些感受可以與敵意抗衡。這種正面經驗亦有助於跨越社會分隔，重申平等，同時也是社會公民權與民主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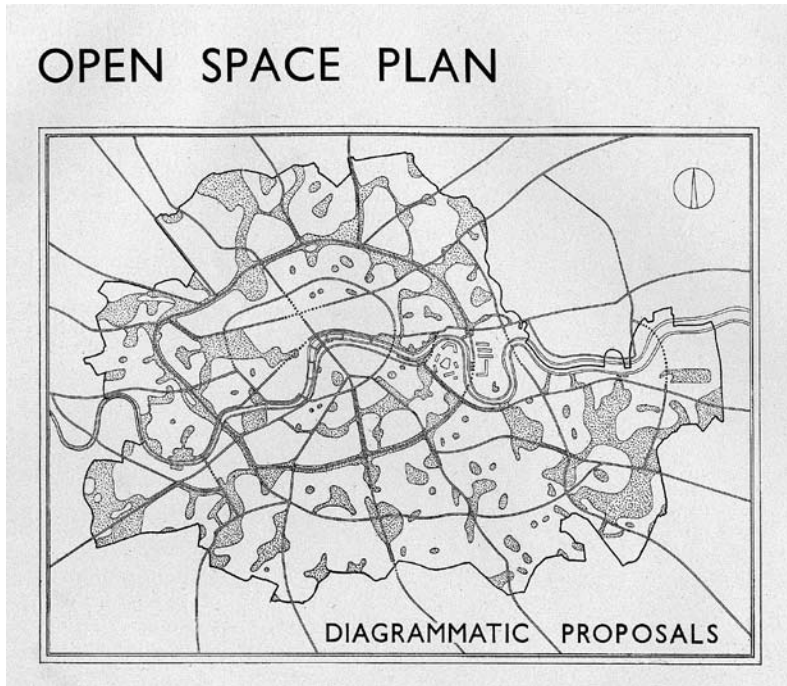
結論

走過地景再造，七年後的今天，哩尾公園開始在地紮根，成為各種不同社會背景的地方居民們舉辦各種娛樂休閒活動的重要據點。實現永續和增進生態多樣棲地的目標是一個持續的進行式，仍然有待努力；但現在公園已然是個安全、吸引人而且相當漂亮的地方。

在一個新自由主義思想根深蒂固的時代裡，像哩尾公園這樣一個恪守紅綠原則(red-green principles)的計畫是非常重要的。透過將另類價值和實作的物質和空間形式具體創造出來，他們駁斥了「沒有另類可能」這種主張，讓另類價值仍然在社會中仍然得以彰顯，並且發展出了存在、行動和想像的另類方式。想想大多數四十歲以下的青壯人口都在新自由思想當道的環境中長成，而且對於關注生態環境是如此普遍地感到疏離，哩尾公園所發揮的功能就更是無比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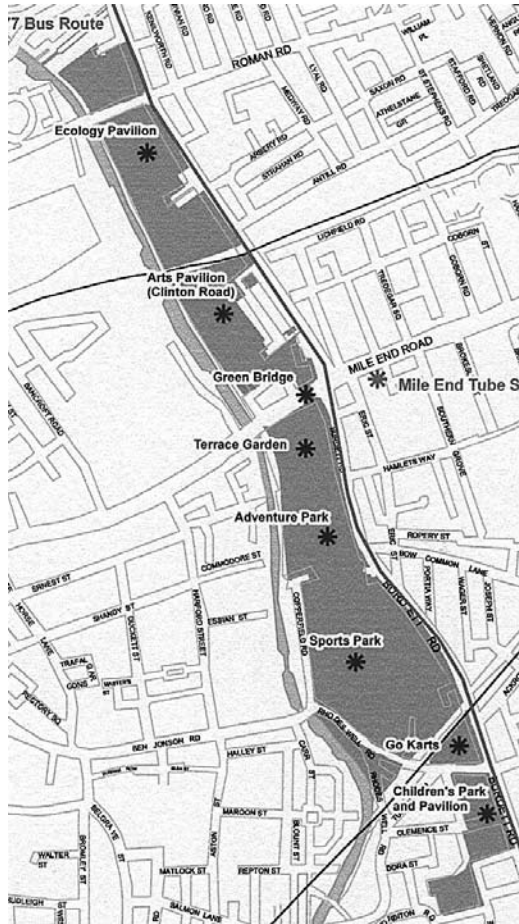
哩尾公園的計畫在英國並不是單一個案，還有許多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小型實驗性計畫與原創行動，正如火如荼地在進行著。這些計畫說明了即使中央政府在鉅觀的層次追逐著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進步的地方行動者仍然有能力運用有利的在地條件形成改變。無疑地，哩尾公園的計畫得以成功，奠基於英國社會中人民公園的歷史傳統與勞工運動長久累積下來的社會民主價值。然而，即使在民主體系、都市化

與工業化歷程，以及勞工運動發展都相對晚近的國家裡，我們仍然可以樂觀期待進步的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可以協力合作，在微觀層次做出改變的契機。



圖一：Forshall and Abercrombie 1943 年對倫敦開放空間的規劃

Source: J.H. Forshall and P. Abercrombie, *County of London Plan* (London, Macmillan, 1943, p.43).



圖二：哩尾公園及其主要的活動中心圖

Source: Section from Mile End Park map 2006, courtesy of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 © Crown Copyright Ordnance Survey.



圖三：從公園的南方看綠橋

Source: Jane Hindley



圖四：從哩尾路上看綠橋

Source: Jane Hindley